

杨翼骥◎著
乔治忠 杨柳◎整理

杨翼骥先生

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



上
一册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K092
20141
1



杨翼骧◎著 乔治忠 杨柳◎整理



杨翼骧先生

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

上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全二册) / 杨翼骧著;乔治忠,杨柳整理.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9

ISBN 978 - 7 - 5013 - 5157 - 2

I. ①杨… II. ①杨… ②乔… ③杨… III. ①史学史—研究—中国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9238 号

责任编辑: 赵媛 南江涛

封面设计: 程言

书名 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全二册)

著者 杨翼骧 著 乔治忠 杨柳 整理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 -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 (邮购)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1/8

印张 112.25

版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5157 - 2

定价 1800.00 元



杨翼骧先生



左起：杨翼骧、王钟翰、王思治



左起：陈光崇、杨翼骧、高振铎、杨廷福、
仓修良、吴泽、赵吕甫



左起：陈其泰、瞿林东、杨翼骧、刘泽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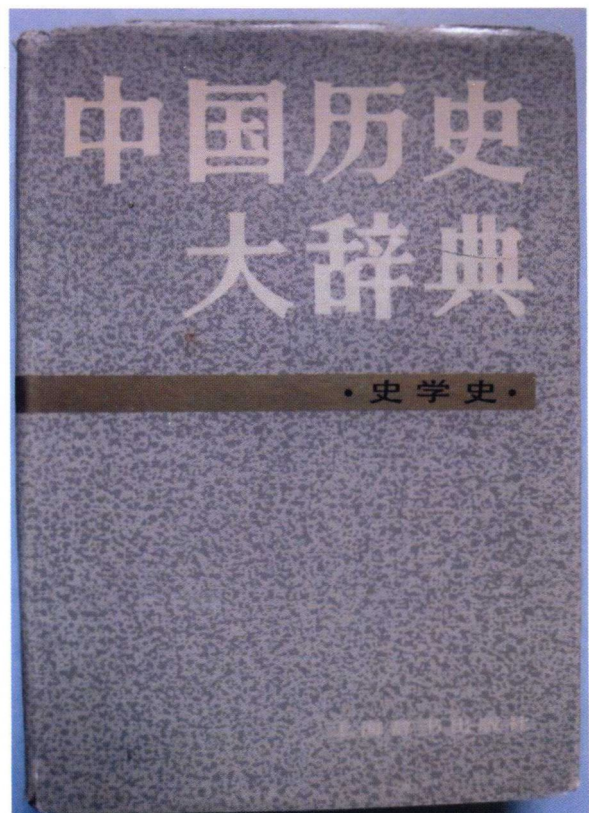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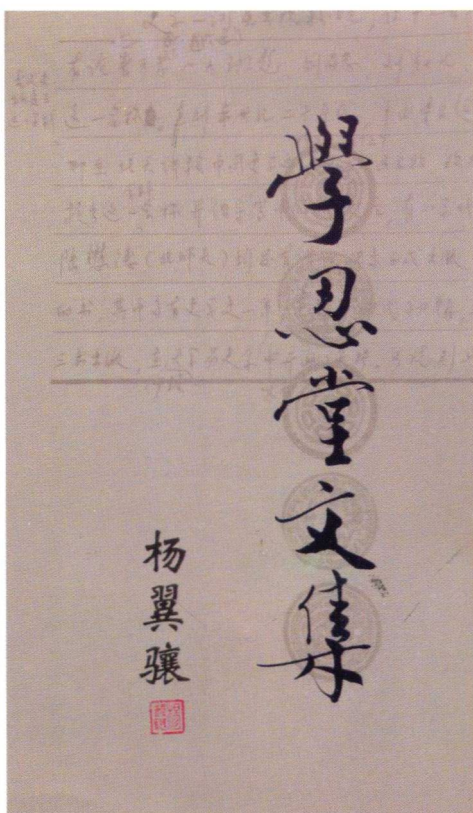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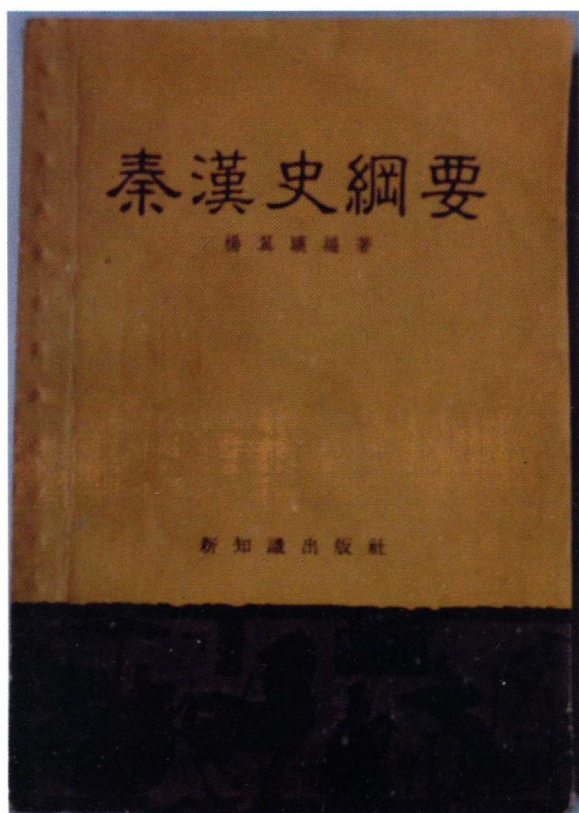
左：师生 1997 年合影
前排右三为南京大学教授邓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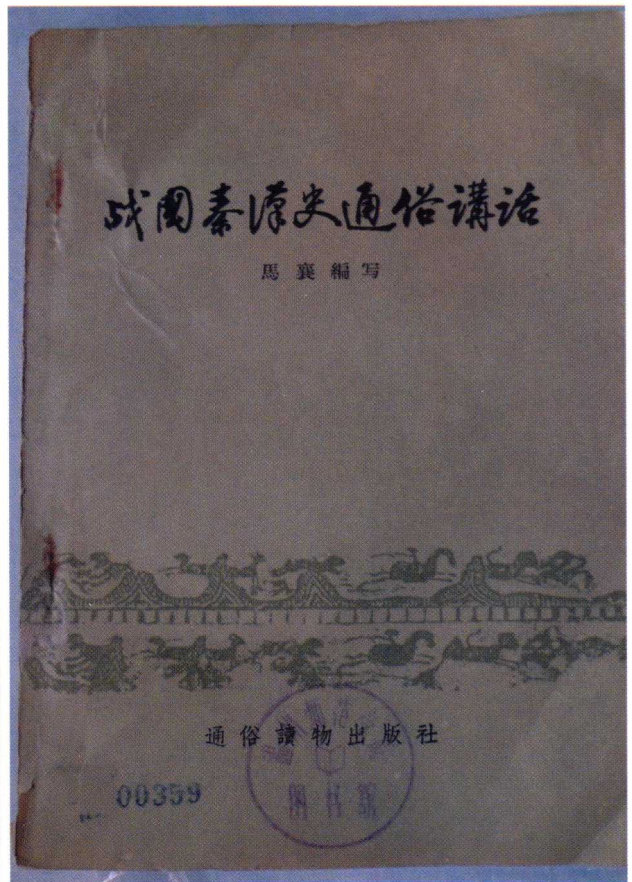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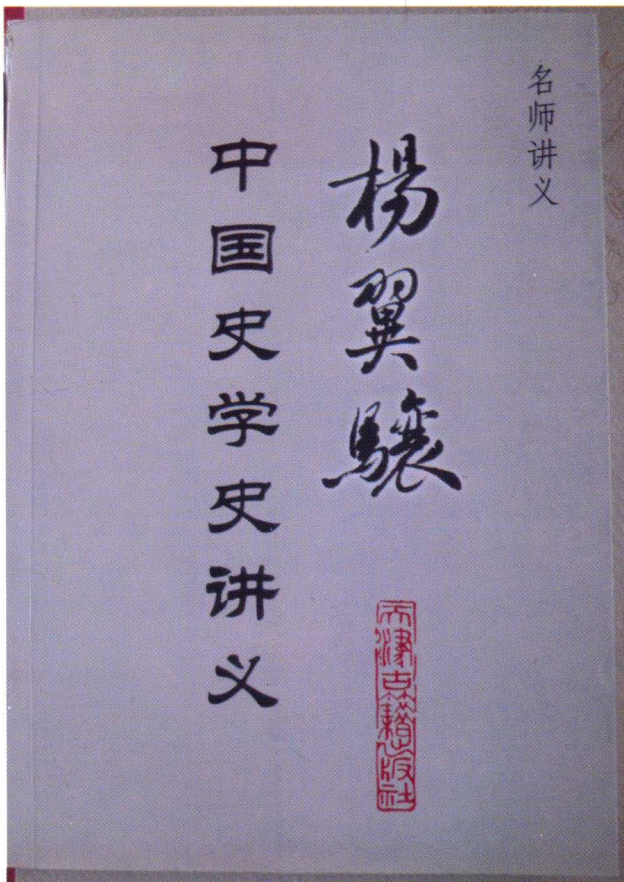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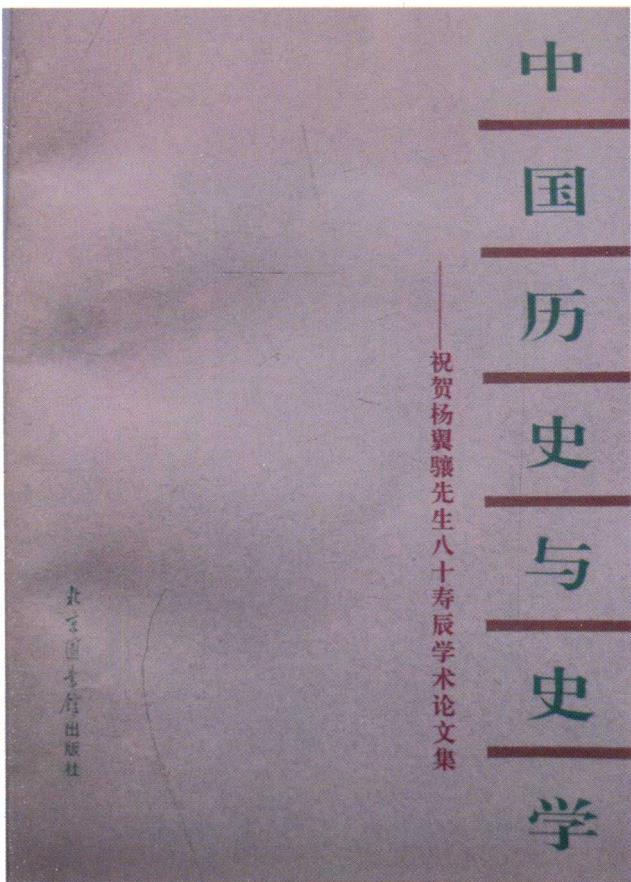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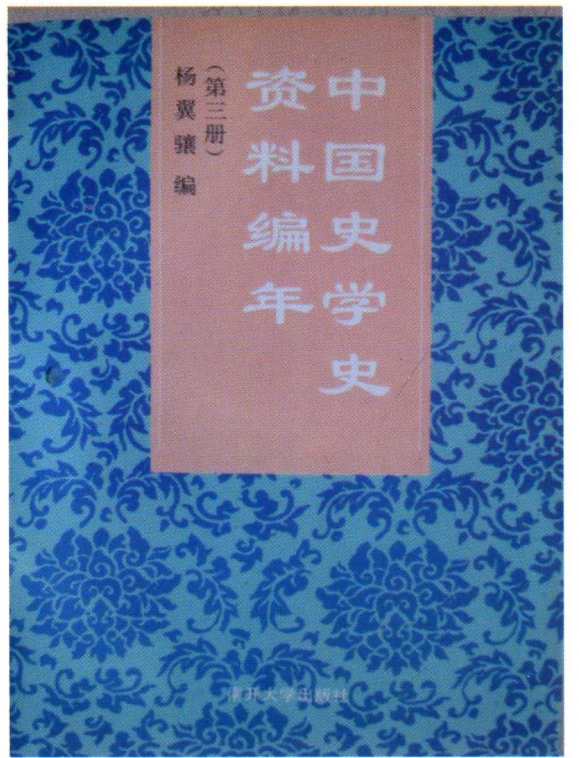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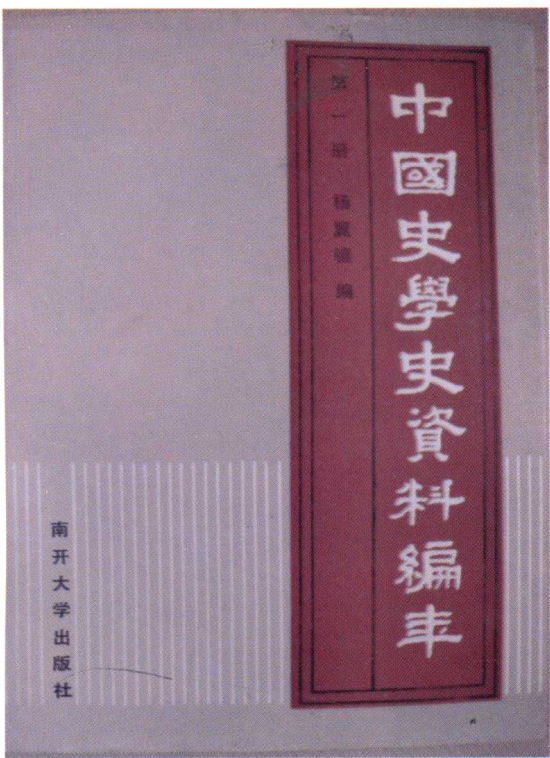


左起：杨翼骧、漆侠、刘文英



前排左起：乔治忠、杨翼骧、施丁、罗澍伟、南炳文
后排左起：孙卫国、杨艳秋、叶振华





第 一 页

翼骥先生：
 承赠中国史学史资料宋代卷，谢谢。此书搜罗甚富，大有益于宋代史学的研究。不知全书共有几册，撰写出版如何安排，是否可以示其梗概，以便在史学史研究上发表。
 此间编辑《卷本中国通史》，于各卷首，请有关专家题字，以资纪念。我想请您为卷中宋史卷题字，只有四个字：中国通史，并署上大名，如盖印章，如蒙惠允，当为本书增加光彩，专此奉愿。顺颂
 文安！
 白寿彝
 1997.1.2

15 × 20 = 300

多卷本《中国通史》稿纸

左：白寿彝先生来信

第 一 页

翼骥先生：
 新年好！
 12月28日惠书收到，谢谢！从惠书中得知，改正先生两腿无力，属属罕见病，亦盼重视治疗与适当运动。冬日，户外寒冷，可在室内适当运动，以增加体力。
 我早盼先着《编年》早日出版，这实是治史学史者必读之书。我正建议，《编年》出版之时，或前三册出版后，可由出版社与贵所联合举办的名，在津开一个小型的学术讨论会，将是很有意义的。
 《通俗译稿》这本小书，还盼先生多多赐教！崇仰，敬复。顺颂
 安康
 林东印
 1997.1.2

15 × 20 = 300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右：瞿林东先生来信

杨先生史序：
先生惠赠大著《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一著》已收到，谢先生。这部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我的学习和研究将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再一次谢先生。

今天上午，白书群师嘱我向您表示谢意，他老人家另有信给先生。白先生让您组织一评书评，放在今年第二期《史学史研究》上，以使更多的学人瞭解这部书。报社发稿日期在即，如有可能，请早日惠寄书评。清先生保重，季此敬颂。

健康长寿

杜维运

杨先生史序：
先生惠赠大著《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一著》已收到，谢先生。这部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我的学习和研究将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再一次谢先生。

今天上午，白书群师嘱我向您表示谢意，他老人家另有信给先生。白先生让您组织一评书评，放在今年第二期《史学史研究》上，以使更多的学人瞭解这部书。报社发稿日期在即，如有可能，请早日惠寄书评。清先生保重，季此敬颂。

健康长寿

杜维运

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

杨先生史序：
先生惠赠大著《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一著》已收到，谢先生。这部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我的学习和研究将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再一次谢先生。

今天上午，白书群师嘱我向您表示谢意，他老人家另有信给先生。白先生让您组织一评书评，放在今年第二期《史学史研究》上，以使更多的学人瞭解这部书。报社发稿日期在即，如有可能，请早日惠寄书评。清先生保重，季此敬颂。

健康长寿

漆侠

浙江学刊

杨先生史序：
先生惠赠大著《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一著》已收到，谢先生。这部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我的学习和研究将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再一次谢先生。

今天上午，白书群师嘱我向您表示谢意，他老人家另有信给先生。白先生让您组织一评书评，放在今年第二期《史学史研究》上，以使更多的学人瞭解这部书。报社发稿日期在即，如有可能，请早日惠寄书评。清先生保重，季此敬颂。

健康长寿

仓修良

致致瞿林东先生信

林东同志：您好！
按读您来信，非常高兴，这正解除了我因未能到京工作，处理后续不成问题，解决了后顾之忧。自可在学习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您过去发表的文章都很好，今后一能继续对您的更多著作。

我对史学史虽有兴趣，但用过去大部分时间是教课以外的一些课，在史学上用力不多，学得很差，尤其是五十年代的中学程度，可以现在重新学习。我学点东西，作为精力储备，从学习于“业余”，现在不动了，而且用脑太久，即感其学路，不但工作问题，效率也低，发生心理压力，不推不拉。

两年多以来，我开始读《中国史学史》，现粗具草稿，因精力不足和修改，原计划明年完成初稿，可是今年初上海师大史学系林东先生和我谈《中国史学史》的工作，我几次谈解都未蒙允准，现由师大史学系和我谈《中国史学史》的编辑，并说明年完稿，这样一来，对我压力太大了，我的工作也就不能按时完成了。

按到林东来信，并想立即回信，但因感冒，身体不好，不能执笔，今天好了些，先草拟数行。我以最近有个专题时，曾同您、林东等几个到津去谈来谈去，您如能用学百造时同志和我同在一个课题组，很熟，我们非常欢迎您。

林东再谈，以后适当时随时联系。致致

李洪

南开大学 NANKAI UNIVERSITY

修良先生：您好！
来信收到，感谢您对我八十岁生日的关注。我的八十岁（虚岁）生日微不足道，不值一庆，无奈我的一些研究中坚持操办，我屡次劝阻，他们不听，只好如此。但嘱咐他们不要张扬，通知范围尽量缩小，所以纪念文章的作者，除过年的研究外，只有少数历史所、史学研究所，另外还有一位在天津的小同乡杜维运。原来定于十月间回国，这些并未通信，不知其他，遂将原来拟定的庆贺文章，请她见到或明或暗与我们联系。

齐治志是我第一个博士生，因学首所成，也升为教授，并于今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我因退休，不再担任博士生，所以他就是我的接班人。他是您的后辈，愿以学望视之，如果他肯向您求教，决不吝指教。

今年夏天天津酷热，因四十岁所著，幸好我已多年有一间房子装上空调，始有避暑之处。进天又买些冷饮，气温下降，夜间已能睡眠，祝您来信中所说的“气爽神怡”。

我现在用钢笔写字，手发酸，改用圆珠笔，说笑话。致致

李洪

致致瞿林东先生信

林东同志：您好！
按读您来信，非常高兴，这正解除了我因未能到京工作，处理后续不成问题，解决了后顾之忧。自可在学习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您过去发表的文章都很好，今后一能继续对您的更多著作。

我对史学史虽有兴趣，但用过去大部分时间是教课以外的一些课，在史学上用力不多，学得很差，尤其是五十年代的中学程度，可以现在重新学习。我学点东西，作为精力储备，从学习于“业余”，现在不动了，而且用脑太久，即感其学路，不但工作问题，效率也低，发生心理压力，不推不拉。

两年多以来，我开始读《中国史学史》，现粗具草稿，因精力不足和修改，原计划明年完成初稿，可是今年初上海师大史学系林东先生和我谈《中国史学史》的工作，我几次谈解都未蒙允准，现由师大史学系和我谈《中国史学史》的编辑，并说明年完稿，这样一来，对我压力太大了，我的工作也就不能按时完成了。

按到林东来信，并想立即回信，但因感冒，身体不好，不能执笔，今天好了些，先草拟数行。我以最近有个专题时，曾同您、林东等几个到津去谈来谈去，您如能用学百造时同志和我同在一个课题组，很熟，我们非常欢迎您。

林东再谈，以后适当时随时联系。致致

李洪

致致瞿林东先生信

林东同志：您好！
按读您来信，非常高兴，这正解除了我因未能到京工作，处理后续不成问题，解决了后顾之忧。自可在学习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您过去发表的文章都很好，今后一能继续对您的更多著作。

我对史学史虽有兴趣，但用过去大部分时间是教课以外的一些课，在史学上用力不多，学得很差，尤其是五十年代的中学程度，可以现在重新学习。我学点东西，作为精力储备，从学习于“业余”，现在不动了，而且用脑太久，即感其学路，不但工作问题，效率也低，发生心理压力，不推不拉。

两年多以来，我开始读《中国史学史》，现粗具草稿，因精力不足和修改，原计划明年完成初稿，可是今年初上海师大史学系林东先生和我谈《中国史学史》的工作，我几次谈解都未蒙允准，现由师大史学系和我谈《中国史学史》的编辑，并说明年完稿，这样一来，对我压力太大了，我的工作也就不能按时完成了。

按到林东来信，并想立即回信，但因感冒，身体不好，不能执笔，今天好了些，先草拟数行。我以最近有个专题时，曾同您、林东等几个到津去谈来谈去，您如能用学百造时同志和我同在一个课题组，很熟，我们非常欢迎您。

林东再谈，以后适当时随时联系。致致

李洪

业师 子昂先生的道德文章

(代序)

乔治忠

敬爱的业师 子昂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到了第十个年头,然音容笑貌,忆之如昨;道德文章,熠熠生辉。值此 先生手稿影印出版之际,重温 先生的著述,回想 先生的教导,不仅增进高山仰止的感怀,加深对中国史学的理解,而且对老一辈学者所经历的时代背景、文化境遇能够产生更为深切的认知。

一、多所周折的求学与治学历程

先生姓杨,讳翼襄,字子昂,籍贯山东省金乡县,1918年8月15日生于一个世代教师的家庭。从小在祖父的督导下读书习字,上小学始,则由父亲监督课外学习。祖父、父亲都是教师,辅导得法,训练严格,因而在小学阶段,先生就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古典经史与文献知识。初中的三年学习,先生不仅学业优秀,而且饱读新潮作家的进步文学作品,于1933年考入山东省立济南高级中学。济南高中是十分著名的优秀中学,特别是1932年宋还吾任校长之后,聘请许多杰出学者为教师,如国文教师中就有李俊民(李守章)、陈翔鹤、王冶秋、李何林、季羨林等等,后来皆成为大学教授和著名学者。此外,济南高中还常常邀请著名专家到校作学术讲座,如历史学家陶希圣、水利学家张含英等,都曾到校作学术讲座,整个学校内充满浓郁的学术文化气氛。高中时期,先生对新兴文学之兴趣仍很浓厚,曾在《山东民国时报》发表几篇散文,又于《山东日报》以发表新诗歌参与文学竞赛,经评奖居然获得第三名,这种成功感激发出先生一种要努力成为作家的冲动,但在同学挚友的解说下,终于改变了志愿,1936年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

进入北大这个著名学府,先生既觉得幸运也值得自豪,但正常的学习生活只不过一年,就发生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时隔不久,北平、天津等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南迁,到长沙组成联合大学。先生正好因暑假回山东家乡,未能与北京大学师生同行,而于9月份得到通知,要到长沙报到。由于战争形势下交通不便,须绕道而行,更兼经济困难,先生于1938年2月方抵达武汉,但此时由于日军进逼,长沙联合大学已经转移到昆明,称为西南联合大学。在当时,从武汉到昆明是没有便捷的交通路线的,原北大、清华、南开的部分师生,在政府与校方的组织和帮助下集体步行走到昆明,师生的行李有车辆运载,沿途住宿与伙食,有官方、校方设法安排,仍备受艰辛才抵达目的地。而先生孑然一人,根本无法在战火纷飞、盗匪出没的环境下徒步前行。唯一的途径是辗转乘车到广西,然后再进入越南,从越南乘火车到昆明,但这一途程旅费不菲,先生只能在行程中打工谋生且积攒路费。1938年12月,在他人的帮助下,先生在距离南宁100多公里的崇善县,找到担任湘桂铁路第三工程总段公文抄写员的工作,每月薪金除生活之外,还可以有几元的节余。更重要的是崇善县图书馆藏有较多史书,阅读方便,先生之工作余暇得以在这个图书馆苦读古今史著,收获颇丰。特别是精读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二书之后,立下了致力于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志愿,这成为先生一生的学术专业方向。在流离之中和尚未复学的状况下,通过读史自学而形成了学术专攻的定见,不能不说是十分的难能可贵。

先生在湘桂铁路第三工程总段工作了8个月,积攒了一些路费,加之湘桂铁路第三工程总段长翟维洋先生的慷慨捐助,于是告辞启程,从崇善出发,经凭祥进入越南河内,乘滇越铁路的火车到达昆明,于1939年9月8日,在西南联合大学报到复学,这时已经耽搁学业两年之久。复学之后,课余时间几乎都用于围绕中国史学史专业的读书研讨。1940年姚从吾教授首次在西南联大历史系讲授中国史学史课,先生在听完第一节课之后,就将习作《晋代之史学》一文呈上姚先生请求指点,得到姚先生的热心鼓励,并且表示希望他能够将中国史学史专业方向坚持下去。1942年7月,先生完成大学学业,以毕业论文《论曹操统一中原》获得北京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指导教师为郑天挺。毕业后,先生即留校任教,依照史学系的安排讲授课程,而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努力也同时继续。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次年三校联合局面结束,各自在北平、天津复校,先生属于北京大学编制。1947年、1948年间,先生陆续发表几篇简洁精湛的中国史学史

楊翼襄

先生

中国
史学
史
手稿
存真



一

论文,如《司马迁记事求真的方法与精神》《班固的史才》《三国时代的史学》等等。

当时,中国史学史专业虽经梁启超等人的大力提倡而树立起来,但仍然属于冷僻学科,史学界多数学者对其不予重视,对史学史整个学科的认识也颇为分歧,很多大学不开设这门课程。例如有人认为史学史是50岁以后才能研究的方向,要对一般历史的研究已经有所成就之后再搞,余嘉锡先生之子余逊即有此类说法,他是先生的朋友,主张各个断代史都有了教学经历、都有研究成果之后,然后再考虑搞史学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出版之后,也有人说中国史学史已经搞完了,剩下的研究余地已然微不足道。这些议论都冲击着先生的专业志向,甚至有人直接劝说先生暂且放弃对中国史学史的研习,工作单位的教学任务也与先生的学术宿愿很不契合。但是,先生还是矢志不移地选定中国史学史为主攻方向,这在北京大学最初任教的几年内已被史学界同仁所了解和理解,在当时,像先生这样从大学二年级就立志研究中国史学史而且面对各种异议仍不改初衷者,尚属唯一,未闻另例,仅此一点,即可传为学术界佳话。1946年9月之后,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史学史的姚从吾先生调任河南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准备请郑天挺先生接任此课,郑天挺先生认为应当由先生承担,无奈当时的体制是讲授这种专门课程,需要教授职称才够资格。又过两三年后的1949年,经由向达教授鼎力保举,才打破常规,决定由先生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对于大学教师而言,教学课程与专业研究的志向合一,无疑是十分惬意的工作。

到1952年,全国进行高等院校学科调整,在调整之中史学史专业更加不受重视,先生被安排到北京政法学院任教,调出北京大学。当然,在政法学院也不会设置史学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

此年,郑天挺先生也奉调到天津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郑先生意欲强化南开的历史学科,与历史系其他领导人谋划,乘高等院校调整之机引进各个专业的人才,遂将先生从北京调到南开大学任教,这里包含着力图发展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学科建设目标。但在当时的气氛下,强调历史学要突出阶级斗争和为政治服务的方向,中国史学史被看做并非教学与研究的当务之急,故1955年才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这是由于郑老的鼎力支持才得以实现的。1958年,“史学革命”的风潮兴起,大字报铺天盖地,史学史课程被横加指责,说是赞扬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史学活动,目标是在史学界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甚至还以漫画讽刺先生好钻冷门,为的是躲避历史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于是,中国史学史的课程又被迫停止了。但先生历尽波折而志向不改,1960年又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了“中国史学史专题研究”的课程,为适应环境的需要,课程中增强了对资产阶级史学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

对于尚未获得稳固学科地位的中国史学史而言,当时在大学设立课程比发表专题论著更为重要,因为向大学生讲述系统的中国史学史知识,使之获得一个学科体系的认知,对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将来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潜在影响。先生矢志不移地标举这一专门学科,给史学界以深刻印象和广泛影响,一旦获得机遇,就会引发史学界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重新定位。南开大学历史系郑天挺等老一辈学者和领导人,对于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教学和研究予以大力支持,亦起到了关键作用。郑老当初执意将先生调来南开,就是想在南开大学历史学科中建设一个特色性专业,这是一项对于历史学学科建设全局性的卓识,视野博大、出以公心,非寻常的学界领导人所堪比拟。郑老于1981年过早地逝世,是史学界、明清史学界的巨大损失,而在南开大学,则更是史学史学科的重大损失。

1961年,教育部下令进行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委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白寿彝先生主持编写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教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泽先生主持编写中国近代史学史教材,全国对于史学史学科的性质、任务、内容、特点等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形势为之一变。这个变化由来有渐,早在1956年,苏联《历史问题》本年第1期发表了题为《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的社论,中国《史学译丛》立即在1956年第2期将之全文翻译转载。此文论断说:“任何一门科学,如果不深刻研究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顺利地发展起来。”这与梁启超早就说过的“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未由明了”^①如出一辙。《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一文还提出:“历史科学史”的目的是研究许多世纪以来的历史知识的积累过程和历史科学发生与发展的过程,研究历史科学中各派别的斗争。因此,所谓“历史科学史”其实就是史学史。文章还批评苏联学术界不重视这门学术的现状,批评了对史学遗产估价不足的错误倾向,反对将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都说成是“前科学时期”或“伪科学”。当时,苏联官方的舆论导向对中国有很大影响,但对于这篇《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尚少有人能够体会出其学术意义,唯先生从史学史专业的角度敏锐地感觉到:苏联的这篇社论,有可能促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再次兴起,遂做出积极反应,除坚持开设此门课程外,还于1957年发表了《三国两晋史学编年》^②一文。直至1980年之后,先生仍然将此篇《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列入研究生课业的阅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章,《史之改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7年第4期。



读目录,以展示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较为重要的环节。而出乎意料的是,1958年又出现“史学革命”引发的波折,致使延迟到1961年,中国史学史学科才得到早就应有的重视。不过,此后文化界、学术界的政治批判运动连续不断,至1966年“文革”运动的全面展开,使整个历史学的研究都已无法正常进行,史学史学科自然也不例外。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1978年开始在全国建立和恢复招考硕士研究生的体制,其中中国史学史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科目,在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正式招收本专业研究生(尹达先生加盟中国史学史专业),这象征着史学史学科建设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多年的起伏周折过程中,先生乃是矢志不移坚持中国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主要学者之一。

二、力求适应 50 年代的治史条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时先生32岁,刚过而立之年,原先并未接受任何一派系统历史哲学的范式,应当说思想上还具有较大的可塑性。随即而来的唯物史观学习与思想改造运动,风靡全国学术界,先生与其他大多数学者一样,都不能不受到深刻影响,采取适应局势的治学举措。1951年,张政烺、余逊、宿白、商鸿逵、金毓黻与先生等六人合作撰成《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一书,于当年10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先生撰写其中《现代的中朝友好关系》一章。这说明当时部分历史学者为适应新生政权的需要所从事的撰述活动,是相当主动和积极的,其中包括了不少名声卓著的长者,这是历史的真实情况。

1953年先生到南开历史系任教,主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依照教学组织上的要求,叙述史事与分析评议都应当致力符合唯物史观的思想和范式,经过学习和探索,先生在以唯物史观研讨历史问题方面也颇有心得,1954年就发表了《为什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①的论文,灵活运用当时最为提倡的阶级观点,给项羽做出了正面的定性分析。文章贯彻不将出身作为阶级分析主要依据的理念,认为项羽虽然出身于楚国的旧贵族,但他响应了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积极进行反抗秦朝残暴统治的斗争,领导军队消灭了秦军的主力,在推翻秦朝、完成农民起义的历史任务中建立了重大功绩,代表了农民阶级的政治利益,应是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此文发表之前,史学界对于项羽这样的历史人物的认识难以把握,在运用阶级分析时无所适从,先生的文章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热烈讨论,并且得到学者普遍的认可。此文在唯物史观框架内评价历史人物,具有辨析理路的开创性。为了证成己说,引据多条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的语句,体现了先生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已然登堂入室,运用起来相当娴熟。1956年发表的《关于汉代奴隶的几个问题》^②一文,辨析了汉代“徒”“赘子”“赘婿”“家人”“白衣”等的社会地位与身份,指明其并非奴隶;全面论证了汉代俘虏与奴隶的关系,奴隶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奴隶的法律地位,奴隶的数量及其在社会人口中的比例,从而论断汉代不是奴隶制社会。论据充分,说理透彻,一举澄清了许多史学界尚多争议和模糊的问题。这篇文章的议题,属于当时学术讨论热点,即“五朵金花”之一的社会分期问题,但文章的显著特点是引据大量史料,以严密的逻辑辩驳异说、得出结论,而不是引用政治领袖和“经典著作”为根据。当时史学界的论文引证语录的风气已经愈演愈烈,而先生却放弃了前一文章《为什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的某些写法,这种改变发人深思,是更加深入理解唯物史观方法论的体现。

1956年3月,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秦汉史纲要》一书,这是在大学课程讲稿基础上修订成书的。本书仅16万多字,以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几大结构简明扼要地论述了秦汉两朝的历史脉络。出版面世后,立即被许多高等院校广泛采用为教材,次年即再版印行^③。书中的学术观点,在国内外史学著述中每每被引用。当时,此书与何兹全先生的《秦汉史略》并行于世,30多年之后,仍被史学界评论为“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方法研究秦汉史而产生的第一批全面记叙秦汉史的著作。两书的作者都是功力极深、造诣甚高的知名学者……其筚路蓝缕之功,则非后来的著作可比”^④。本书确实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教学环境撰写的教材,如对于赤眉、绿林等农民武装的暴动,没有一句批评之词;对许多政治、经济问题多使用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分析等等。但另一方面,引据的历史资料十分丰富,能够精辟透彻地叙述史事的原委,例如第四章中仅以1000多字就将西汉后期的“五德终始说”“三统说”的梗概以及与此相关的多起重大政治事件论述清晰。第七章(最后一章)第三节《经今古文学派之争》也异常精彩,不仅叙述了刘向、刘歆整

① 《历史教学》1954年5月号。

② 《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第2期。

③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11月重印。

④ 《中国历史学四十年》载林剑鸣之文,书目文献出版社(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22页。



理图书工作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的来由、演化,而且做出了中肯的评析。同时,全书只象征性引用三四条“经典著作”的语录,在当时的教材中可以说少得不能再少,体现出很不认同于“以论带史”的理念,而具有在唯物史观框架下重于史料的治史特征。

以上所列,均为先生力求适应 50 年代社会文化环境而做出的努力,在整体上接受主流理念、随从主导的历史范式,但具体的研讨还是保持了重于史料考核、实事求是的风格。而这种适应社会政治环境的治史方式,1957 年之后也主动地做出了改变,回转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基础建设。对此,谨于后文另加叙述。

三、明哲守正的节操 孤标特立的风范

1957 年的“大鸣大放”及随后的“反右”运动,对整个知识界、文化界众多成员的处世态度、品格修养、精神面目、原则立场等等,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在“大鸣大放”期间,先生恪守自己的信念,在各种会议上未曾发言,由于“大鸣大放”会议中发言者十分踊跃,也没人注意到先生的低调和沉默。在局面转向为反右运动之后,先生也未曾揭发、批判任何一个人,未发表过一篇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一个偌大的政治运动,居然这样逍遥渡过,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但也并非独此一例,著名学者钱锺书不也有类似的经历吗!达此大智若愚的境界,全赖自身具备一派明哲、守正的品质和节操,保持理智、持重的精神与格调。众所周知,50 年代后的文化界、史学界,早就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大小不等的批判运动,学术问题也往往纳入政治斗争的框架。先生是从未卷入此类批判运动的少数学者之一,虽然 he 有能力、有条件参与某些批判,也确有一些他所不赞同的学者及其观点,当时已然成为被批判对象,有些在治学和处世上实可訾议的学人被定为右派,但是先生决不借助政治运动整人,决不加入“墙倒众人推”的行列,而是以纯正学者的情操,始终保持了沉默的态度,始终未曾参与越出学术范围的大批判,这无疑是很值得钦敬的。

先生对人、对事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虽有见解,但不轻易地发表或褒或贬的看法,往往还要继续观察,随时修订自己的认识。他为人和善,言谈委婉,与各个层次的人——无论官员、学者、工友、学生都能谈得拢、说得来,和蔼的态度中自然而然地透出睿智和正气。然而谦虚、谨慎的素养并未妨碍严肃、认真的原则性,先生始终厌弃种种违反规则的行为,在学术上、行政上,办事光明磊落,远离和拒绝拉关系、走偏门的“策略”,凡事心中自有定见、坚持规范,不顾及人情请托,不随风气。例如 1983 年成立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先生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次年按学校的安排,在整个天津市范围内招考研究人员,先生负责招考历史文献学研究者,考题和判卷标准乃以是否真正阅读过有关古籍为基点,凡暴露出仅仅间接得到古籍知识、而未曾直接阅读古籍原书之人,一概摈落,其中包括校领导与历史系教授为之请托的参考人员。其他诸如在职称评定机制中、在史学史博士点的建设中、在古籍整理的工作中、在拟定研究生考题及阅卷中,都坚持原则、严守规范,其例甚多,恕不枚举。在有些人士看来,这似乎太不通人情,但无论如何无法否定其正当、正派和正气岸然的风范。这种明哲守正的节操、孤标特立的格调,也会被一些人疏远或反感,也会造成一些误解,在某种社会环境和学风变化的形势下,或许会影响南开大学史学史学科发展抓住有利的时机,但这是先生几十年做人的准则,堂堂正正,后人无可非议。

1957 年之后,史学界的大量论文都热衷于引用“经典著作”和政治领袖语录论证问题、说明主张,而先生的治史思路的走向却正好相反,一改《为什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那样的引证风格,而且撰述的重点重新回到中国古代史学史范围。其中除《三国两晋史学编年》《南北朝史学编年》^①为纯属资料整理之外,《裴松之与〈三国志注〉》^②《刘知幾与〈史通〉》^③是两大名篇,篇幅很大,内容全面,但全文并没有阶级分析、政治思想评价之类的内容,与当时史学界其他学者的同类论文、与先生自己前一阶段的论文都存在很大反差。《我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④一文,虽在标题内使用“奴隶社会”词语,但只是作为通行的时间断限概念,全文内容并不涉及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的问题。这是确立要重新将治学基点放在中国史学史方面,而且主要做中国史学史的基础建设和资料建设所导致的改变。1957 年之后,不属于史学史范围之内者,只有 1959 年发表的《曹操打乌桓是反侵略吗?》^⑤一文,此文的背景是当时史学界出现的热点议题,即对曹操的历史评论。而评论曹操,是出于对 1958 年所谓“史学革命”否定所有帝王将相倾向的纠正,由郭

① 《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 年第 1 期。

② 《历史教学》1963 年第 2 期。

③ 《历史教学》1963 年第 7 期、第 8 期。

④ 《天津日报·学术专刊》1961 年 12 月 6 日。

⑤ 《天津日报·学术专刊》1959 年 5 月 11 日。原署名:木羽。



沫若、翦伯赞等发起要为曹操翻案。这次学术讨论,学者各抒己解,没有政治干预,也不存在权威学者以势压人的现象,这在五六十年代历史热点讨论中是少见的纯学术机制。但在讨论中,也不免出现议论偏颇、矫枉过正的状况。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学士学位论文,就研究曹操的功业和事迹,熟于此项问题的历史资料,关注曹操问题的讨论是理所当然的。鉴于史学界内郭沫若等学者一致认为曹操对乌桓的征战属于反侵略,并不合乎史实,故而撰文商讨。此文纯以广搜史料为依据,没有“以论带史”的任何倾向,而且以临时拟定的笔名“木羽”署名发表,即唯欲厘清史实、救时论之偏而已。

先生非常重视历史教学和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他在本科课程的执教中练就极强的基本功,但其中也有一些独特的个性,例如讲授课程拒绝录音。先生极少为自己的研究生推荐论文发表,甚至认为研究生不必急于发表文章;招收博士生基本都有在学校、研究所或文化机构工作过的经历,并不吸收没有工作经历的学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而且从来不解释个中原因,只能通过历年的实例来加以体会。可以看出这是先生既定的原则而被一直坚持,孤标特立于学界,未曾向任何人解释和推广。所有这些,纯属个人的个性风格,因而不必讨论其是否合乎时宜。

四、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贡献

进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是先生始终坚持的学术方向,在大学求学期间,即已偏重于中国史学史的学习和探讨,曾因撰写史学史方面的论文而得到著名教授姚从吾的赞许与鼓励。1947年、1948年发表了《司马迁记事求真的方法与精神》《班固的史才》《三国时代的史学》等论文,初步展现了善于审核史料与分析、概括的治史功力。

1949年之后的整个50年代,由于前述种种原因,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在内地暂时冷落,而先生在进行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同时,仍未放弃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与关注。1956年苏联《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一文翻译发表,先生从中体察到史学史学科将要兴起,于是撰写《三国两晋史学编年》,并且于1957年发表,这是一篇很有学术分量的长文,是新中国成立后内地最早的中国史学史论文之一。1961年起,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与讨论在全国展开,他接连撰写、发表《我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刘知幾与〈史通〉》《南北朝史学编年》等重要论文。这些专题论文以视角全面、见解中肯、理据充沛而享誉史学界,上述前三篇同时于1980年转刊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之中,其中《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后来又以“裴松之”为题收录于《中国史学家评传》^①一书,2006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史学史读本》再一次收录,这充分显示了先生论文经得起时间考验,且广受史学界重视的学术价值。

先生的论文,大多具有全面考察研究对象,而采取分条归类、层层剖析的特点。例如《裴松之与〈三国志注〉》一文,分别从裴松之的生平及著作、《三国志注》的内容、《三国志注》的价值、裴氏的史学贡献等四大问题展开论述,涵盖了需要研究问题的各个方面。而对于《三国志注》的内容,总结为八类,分条逐次予以论述;对于裴松之的史学贡献,总结为四点,阐明他对史注的发展和创新。整篇文章的结构是大小层次的条分类析,论述中有分析、有归纳也有综合,得出条理分明、轮廓明朗的统括性认识。《关于汉代奴隶的几个问题》《刘知幾与〈史通〉》等重要文章,无不如此,形成一种全面研究、归类叙述的架构。这种条分类析、统括综合的研究方法,表现为以形式逻辑思维方法来谙练地驾驭众多的史料,这是先生史学论著的特点与优点之一。

1979年,先生与华东师大教授吴泽先生共同承担《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的主编工作,并且专职负责中国古代史学史部分。他除了自撰许多词条之外,还将古代部分2000余词条逐字逐句审定修改,整齐文笔,划一体式,有的甚至重写,投入了大量精力,其认真负责的精神感动了许多同事。并且先生曾两次多日客居上海、无锡,与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通力协作,校订文字,润色语句,精益求精地完成了任务。该书于1983年出版,成为《中国历史大辞典》中最先告成者,为全书的编纂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此书是第一部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辞书,面世之后,立即受到海内外文化界的注目与欢迎,评论为“确是我国史学工作不可多得的一部很好的工具书”,具有科学性、系统性、知识性、实用性等优点,是“我国史学界开创性的可喜成果”^②。而台湾明文出版公司竟将主编者名氏删去,改书名为“中国史学史辞典”,内容一字不差地重新排印发行,借以牟利。这从另一特殊侧面也反映了该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

此后,先生利用多年积累的史料素材,致力编纂多卷本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此书内容是将历代关乎史学史的资料予以精选,按年代顺序编排,并且依需要加用精辟案语进行考释。1987年第一册出版,即广受欢迎,《史学史研

^①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参阅《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3期的书评。



究》《历史教学》等学术刊物皆发表书评,赞扬此书具有史料真切、编法朴实、考订精审、内容宏博的特点,“有很高的学术性和实用性,凡是研治中国史学史的学者,皆可将之作为一种兼能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书”,是“首创性的具有为后人修桥铺路性质的书”^①。1994年10月第二册(两宋时期)出版,著名的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致信说“此书收罗甚富,大有益于宋代史学的研究”,并且热情邀请先生为大型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宋史卷题写“中国通史”四字^②。其他著名学者来信赞扬者数量很多,不胜枚举,《史学史研究》亦发表书评,认为本书“具备勾画史学发展全景的学术宗旨”,“这部《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乃以著作家的史识和总揽史学发展全局的眼光而致力于资料纂辑,在学术上作出了无私的奉献”^③。在海外,一些与先生素不相识的学者读到《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表示由衷佩服,遇见南开大学历史学者,每每询问先生的情况,且赞扬他是“学术大师”“史学史大师”,足见先生影响之大、声誉之高^④。此书已经出版了三册,尚有一册有待面世。相信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同行,都会从本书中获取裨益,得到启迪。初学者可据之为起步探讨的基石,有一定造诣的专业学者亦可援为深入研究的阶梯,从而使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持续、深化地向前推进。这是先生对史学史学科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做好中国史学史的本科教学与精心培养本专业研究生,是先生在学科建设上的重要贡献之一。在大学的教学中,先生具备忘我的敬业精神。他开设的多种课程门门认真备课,并且时时修正观点,补充内容,得到教师和学生的好评。特别是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讲授的中国史学史课,如上文所述是从1955年起历年开设的课程,先生尽心尽责;讲课时从不携带讲稿,仅仅手持一叠卡片,其中大多为抄录的史料原文,讲述的内容以系统全面、资料丰富、条理明晰、分析精到、语言生动、速度适中、板书工整、重点突出而著称。前来听课的不仅有本校大学生,还有研究生,先生不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而且应邀到其他大学讲课。早在1958年春,先生就在天津师范学院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一个学期,1961年教育部提倡开设中国史学史的课程之后,先生得到安徽大学的聘请,于本年11月23日至12月8日在安徽大学历史系集中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共讲授26课时。另对安徽大学师生、合肥师范学院师生、安徽省历史学者作学术讲座5次,呈满负荷工作状态。这些授课工作,对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奠基作用。

在指导研究生、博士生的工作中,先生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研究生一经报到入学,先生就发给《中国史学史专业阅读目录》,其中列出十几类需要阅览的论文和论著,如第一类,列出的是关于中国史学史性质、任务、学科特点等理论性论文;第二类则为通贯、系统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和教科书;第三类为学习中国史学史的主要工具书、资料书;第四类乃史学概论、历史研究法的著述;第五类是古今解题目录撰述如《四库全书总目》等等;第六类属于目录学的当代著述如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等先生。对所列入的书籍一一作了讲解,指出各篇、各书的基本特点、主要内容和对于学习史学史专业的必要性。于是,系统性的研习规划和知识体系便展现于学生面前,一举打开了中国史学史专业的洞天福地,前景豁然开朗,使人立即体会到有导师的指点而门径大开,大不同于自行摸索。先生审阅研究生论文,总是以工整、秀丽的字体逐页写有旁批,批改内容不仅涉及史料、行文和论点,而且连错字、误笔、用错的标点也一一标出,付出的心血简直无以估计。在先生的心目中,教学与培养研究生是最重要的本职工作,正如其《学忍堂文集·自序》所言:“清代大学者钱大昕有‘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之语,还应补上一句:‘尽心育后学,胜著等身书。’为人做‘教书匠’者,幸莫大焉!福莫大焉!”

五、绵绵无尽的怀思

先生于1978年正式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此年我入学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史本科学习。1981年,我获得与77届毕业生一同报考研究生的机会,决定选择史学史专业,遂成为先生的弟子。此后学习中产生了问题,都能够随时向先生请教,先生也乐于指导、讨论,因而学业进步日益明显,学有良师,这真是莫大的福气!硕士生期间的两份读书报告,都得到先生的首肯,后来均公开发表。硕士学位论文也得到了先生的佳评,先生的这些肯定成为我继续研讨历史学的鞭策和鼓励。

1984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先生安排我到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不久领得一项古籍整理业务,我的心愿还是想以

① 分别参阅《历史教学》1988年第1期、《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4期的书评。

② 据白寿彝先生1995年4月8日致杨翼骧先生的信件,未刊。

③ 参阅《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2期的书评。

④ 此事曾有几位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提起,在冯尔康《我的南开老师》一文中亦有所记述,见《天津史学会通讯》第一期,2000年9月印本,第8页。



主要精力研讨中国史学史,害怕古籍整理占去过多的时间,同时觉得这是枯燥难干的工作,不如撰写论文、著述更有影响。将此想法向先生倾诉后,先生郑重教导说:作为古籍研究所成员,首先应当做好组织交与的本职工作,这是工作态度问题,况且整理古籍是打好学业基础、锻炼基本功的极好方式,有益无弊。谨遵师命,我便开始认真校注《众家编年体晋史》,由于有着随时请教先生的条件,较快完成了任务并且成书出版,这是我的第一部面世之作,心情自然无比愉快。因感念先生的训导,感念先生的指点,便在敬赠给先生的书册上写了四言八句:“得侍函丈,历历八年。教诲谆谆,开导惓惓。沛然雨露,润我心田。愧焉寸草,报此一编。”先生看后,微笑而颌之,表达了对弟子初步取得一点成绩的欣慰。

1986年,先生第一次招收博士研究生,应允我作为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报考者,并且在考试之前就询问了是否对学位论文选题有所考虑等问题,我答以很想研究清朝的官方史学,叙述了初步的认识和设想,先生大为赞赏,同时也点明这个选题具有较大的难度。事实果如先生所言,论文的准备和撰写费时耗力,进度迟缓,但在先生的鼓励与指点下也获得许多新颖的认知,成为提高个人史学研究水平的契机。

先生不仅指导治学,而且强调做人的道理,并以自身严于律己、明哲守正、不争名利、朴实稳重的风格树立了榜样。1993年9月19日至26日,先生连续几次对毕业和在学的弟子讲述“治学与做人”的道理,指出品德修养比治学更为重要,作为学者和教师需要严格检点、克服缺点,比其他行业的人士更应该注意品格、风范,连所谓的小节也不能轻忽,因为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对学生有所影响。学者为人要真诚、宽厚,要谦虚、谨慎,要尊人、自重,如果不好好做人,治学也很难真正做好。同时也指出治学需要有雄心、专心、细心、虚心的素养。学者在年轻时就要有大的目标和规划,要立下雄心壮志。定好学术目标后应当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学术研究者虽然允许做新的选择,但不能动辄改行,这山望着那山高,认真选择专业之后,不要轻易改变,不能朝三暮四。要将一生主要精力用于自己选定的专业,“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切于己者虽锱铢不遗”,这就是“专心”^①。读书、写文章都要细心,这样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少出讹误。治学与做人一样,也要虚心,“治学不虚,学问进步缓慢,并且容易出学术上的失误”^②。这次专题讲座在先生的家中进行,乃有为而发,对我和几位同门师兄弟皆有较大的警醒效用。

1995年底,先生出于对南开史学史专业发展的需要,也出于对我的提携,以78岁的高龄顶着刺骨寒风,两次到学校行政办公楼,走访校长以及有关负责人员,要求尽快将我提升为正高级职称,得到校领导的充分重视,经研究认为这确实对当时历史学科的建设十分必要,不能因为史学史专业博士生招生的间断,而丢失在全国卓有特色的博士学科点,于是问题得以解决,我以副教授在岗4年的资历提前升为正教授。先生的作为乃是似有私情而实质为公,具有古代贤人君子“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至公精神,而在我则深深感激先生的厚爱之意。

1997年8月,由众弟子发起、操办,举行了先生八十华诞的庆贺活动,出版了《中国历史与史学——祝贺杨翼骧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一书。来自全国各地的原硕士、博士研究生与先生共聚一堂。两三天的聚会之日,先生欣喜异常、精神振奋,其健康和乐观的形象,至今仍浮现于我眼前,多么希望再回到那一年代、那一场景!而当年冬,先生再次对我郑重训示,应当离开古籍研究所,调往历史系工作,将南开大学的中国史学史学科维持和发展下去。因为在先生看来,历史系兼具历史教学和史学研究职能,那才真正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所应倚赖的机构。不久,在各方的协调和操作下,我调入历史系,因明了身上已经肩负了先生的学术嘱托,便决心矢志不移地在本专业的发展上尽心尽力。

先生指导学生,不厌烦劳,但自己的撰述,则必独立完成,决不假手于弟子。唯2002年编辑个人论文集之时,因身体多病,才委托我与另一弟子代劳,对此,先生曾颇为感慨。先生亲定文集名为“学忍堂文集”,并且解释说:“学忍堂”是家里的祖传堂名,将之作为书名,一是怀思祖辈,二是对后学有所寄望。先生认为“忍”是一种修养、一种美德,学者不宜血气方刚,毫无忍性,应在“学忍”中明了何者当忍、何者不忍,把握好“忍”的度量,这个度量应当大些。对于个人文集的定名,表现出先生在多病的晚年,仍然关注晚辈的修养和成长之深意。

先生在看到自己的《学忍堂文集》成书后不久,即于2002年12月的一天,将多年积累的中国史学史手稿交我留存,没有任何人在场与得知。这一嘱托实属意外,令我一时不知如何应对。

2003年2月中旬,先生又一次住院疗养,病情似有好转,一天我去看望,先生也自言身体感觉良好。我说明近日要赴北京,参加《清史》编纂体例的学术研讨会议,需要提交文章以及做些其他准备,先生还与我交谈了《清史》体例及相关问题。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为先生与我的最后谈话!2月22日中午,北京的这次会议尚未结束,我忽然接到先生逝世的消息,一时极为惊愕,于是匆匆返津,在列车上凝望窗外,吟成七律一首,谨录于此,以作为对恩师绵绵无尽的

① 《学忍堂文集·谈治学与做人》,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57页。

② 《学忍堂文集·谈治学与做人》,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60页。

追思和悼念：

昔我拜师从子昂，而今隔世事苍黄。
杏坛训谕留纲则，史苑论评立典章。
大地巍巍耸五岳，长空烁烁曜三光。
先生治史仍学忍，捧读遗文多感伤！

六、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手稿》

先生自最初系统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之时，就有志于撰写一部新型的《中国史学史》。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对于唯物史观的学习，他拟定将中国史学史的课程自上古讲述到1949年，且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1949年之前的发展单列为一章，应当说这是经过认真思考、很合时宜的构想，也是计划撰写《中国史学史》的一个基本思路。先生在1994年曾说在解放初讲授中国史学史，“备课时用十六开白报纸写出详细提纲，其中主要是基本材料。边学边教，边教边学，教学相长，收获不小，一年下来积累了六厚册讲稿。那时初学马克思主义，只知道一点简单的基本原理，还谈不上运用。但这是我自己首次写成的中国史学史教材，为以后讲课奠定了基础，敝帚自珍，现在这些稿纸早已发黄变脆，一翻动就落碎了”^①。据此，最早写于白报纸的讲稿应当至1994年仍有保存，但现今已然不能得见，基本佚失。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之后，史学史学科的前景很不乐观，连在大学内能否开课都成了问题，加之由上而下部署的学习唯物史观运动以及各种社会运动，欲真正撰成与出版新式的《中国史学史》，实在难以实现。1961年之后，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迎来一个高潮，然而史学史的知识体系、主导线索、必要内容等等理论问题，学术界虽热烈地讨论却难以解决，其中关键之处是：如何附和时下畅行的历史研究的阶级路线、阶级分析方法？如何纳入五种社会形态顺次发展的框架？如何表达出革命化的史学理念？例如有的意见认为：史学史应反映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但不是叙述阶级斗争的本身，而是分析历史学家、历史学派在思想领域内的斗争^②。有的意见径直指出史学史应当“以阶级斗争作为贯穿史学发展整个过程的一条红线”^③。有的意见认为新的中国史学史应当具有新的特点，一是要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二是要注意史学发展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关系，特别要注意阶级分析；三是要批判近代资产阶级反动史学，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④。这些议论均有值得重视的见解，但都强调了阶级斗争，而要使中国史学史内容贯穿阶级斗争，则实在是难以措手的问题，因为古代的史著基本都是剥削阶级学者所撰写。先生以一人之力几年内未能撰成和出版中国史学史著述，是很正常的结果。而细细检核先生之手稿，其中有部分稿纸纸张粗糙、颜色黝黑，应为1960年代初所撰写，可见在1961年教育部提倡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之后，先生撰写书稿的工作已然重新起步。

到了80年代，先生的写作计划中有两大项目，一是要撰著《中国史学史》，二是编纂《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先做哪一项？先生曾颇费斟酌，甚至曾与我等几名弟子商量。但《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的编辑修订，又占去几年的时间，1983年《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出版面世以后，先生才有了可能集中精力撰著。但这种撰写《中国史学史》书稿的工作，也就进行了二三年，随后先生就将重点改为先进行《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编纂工作。正如后来先生接受访谈之时所说：“我在80年代初，也因受到中国史学史研究日益兴盛的感染，不顾浅薄，要写一本专著。但因奉命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的编纂工作，未能如愿。接着又应出版社之约，编撰《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⑤撰著次序转变为以《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为先，应当也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史学史的新成果不断涌现，论文数量大增，许多过去未曾研究的问题得以被开发和探讨，系统的中国史学史著述需要重新估量叙述内容的增补，重做体系、结构和主导线索的设定。而且这一时期也是文化思想、学术思想逐步嬗变的年代，史家、史书、史学评论的标尺和价值观处于连续变化的状态，特别是对近代史家如胡适、钱穆、傅斯年等等及其著作的评价，开始呈现为某些冰火两重天的异动，原已形成的见解和写好的书稿文字，多有需要认真思考、大加修订甚至推倒重来的趋势。这使

① 宁泊：《史学史研究的今与昔——访杨翼骧先生》，载《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② 见《学术月刊》1961年10月号载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

③ 见《文史哲》1963年第4期载汪伯岩：《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问题》。

④ 见《文史哲》1963年第6期载师宁：《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些问题》。

⑤ 宁泊：《史学史研究的今与昔——访杨翼骧先生》，载《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

一向撰述谨慎的先生不得不做出了选择,暂且放下《中国史学史》书稿的撰写工作,先编纂《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同样是十分耗时费力的工作,加之先生晚年身体多病,竟使撰写《中国史学史》专著的工作再无机会完成,然而所留存的撰写手稿,却也积累得相当可观。

时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先生自知已经难以完成《中国史学史》的专著,遂不复言说自己已有手稿,尤其2002年初,刘泽华教授亲到先生家中,动员先生编纂学术论文集,并且提出可以将历年讲授中国史学史的讲稿中某些章节整理成文,增加文集的内容。当时先生立即回应说自己并无中国史学史的讲稿或手稿。2002年11月,先生文集《学忍堂文集》出版发行,先生在翻阅浏览中显露出欣慰之情。时隔几日的12月某天,我去探望病中的先生,与先生对话中师母恰出外购物,先生忽然令我从旧书柜中取出一个装满纸稿的深色塑料袋,打开后指点说这是多年积累的中国史学史书稿,令我带走留存,或许可以用于教学参考,此事无人知晓,也不必再向任何人提起,亦不要试图出版,因为其中许多内容残缺未成,许多观点已经过时,无法再作修订。今思这些手稿毕竟是先生平生治学留下的真迹,凝结了先生的心血,不应在弟子手中隐没。将之出版虽稍稍不合先生原意,但对本学科的建设应该甚有裨益。谨拜阅先生手稿,将几项基本情况简述如下:

1. 手稿均用规范、秀丽的字体写于正式稿纸,说明原本是准备交付出版而撰写的。但多页稿纸周边写有大量补充文字,这是随时做出的修订、补充,说明先生时时作出新的探讨,并未将写在稿纸的内容视为定稿。手稿内容有一些重复,这是修改重抄所造成,说明改写过程乃是反复进行的。

2. 手稿未曾装订,也没有统一的页码顺序,但某些章节、某些专题是有连续页码的。各个部分的标题序号,尚存在着不一致之处,有些专门题目下缺少完备内容,留下空白稿纸尚待补写。凡此种种,显示了书稿是未成之作,撰写过程是处于有所断续的状态的。

3. 根据纸张和先生的学术经历判断,除少数内容撰写于20世纪60年代外,大多内容应撰写于1983年到1986年间。此时全国范围内的历史观念虽然有所松动和改变,但对近代史学的主流评价还较多地承袭了五六十年代的框架,故先生手稿的内容也呈现此种思想特征。至于稿纸周边的补充文字何时添加,则难于判断。

书稿虽然未抵于成,但许多论述颇具参考价值,如对唐后五代史馆建置和官方修史机制的论述,对辽、金时期国史院的评析等等,有画龙点睛、言简意赅之妙;对近代居延汉简之发现过程、研究状况的论述,条理详明;对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和后来修改本的对照和评论,客观公正,中肯确切,这都是极具学术价值之处。实例尚多,不必枚举。综合以上情况,决定将先生手稿予以整理编排,以影印方式出版面世,这样既保存了手稿的真貌,亦可提供给学界同行以参考。至于先生本人认为内中有已经过时的观点,因而不愿公布,今考虑那毕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态,是那一代老一辈学者多所周折治学历程的写照,无伤于先生的形象,且可以作为对整个中国学术史反思的资料。

在书稿的整理过程中,先生的孙女杨柳做了不少辅助的工作。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予以了大力支持,不仅俯允接受本书的出版,而且做了许多技术性的处理,谨此致以由衷的谢忱!

杨翼骥先生

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



杨翼骥

目录

上册

绪论

一、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意义	一
二、中国史学史的内容	六
1. 历史编纂学	六
2. 历史观点	八
3. 史学思想	九
4. 历史研究法	一一
5. 史官制度	一二
6. 史学批评	一三
7. 史学流派	一四
8. 重要史学家的生平事迹与治学经过	一五
三、过去对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	一八
四、中国史学史的分期问题	二三
第一章 史学的萌芽:殷、西周、春秋时期的史学	二六
第一节 史学的起源	二六
一、甲骨文	二九
二、夏代的文字问题	三一
三、金文	三七
第二节 殷周时期的史官	三九
第三节 西周、春秋时期的史书	四六
一、《尚书》	四七
1. 《尚书》的流传与真伪问题	四八
2. 《尚书》的内容与价值	五三
二、《逸周书》	六〇
三、《春秋》	六六
第四节 殷、西周、春秋时期的历史观、史学思想与历史编纂学	七五
一、历史观	七五
二、史学思想	七八
1. 肯定了历史知识的鉴戒作用	七八